

Reception of Tongcheng School Prose in Kim Taeg-young's Classical Chinese Essays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 Sino-Korean Cultural Exchange

YANG Huimin

Suqian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rch 3, 2025

Accepted: March 29, 2025

Published: June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Huimin. (2025). Reception of Tongcheng School Prose in Kim Taeg-young's Classical Chinese Essays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 Sino-Korean Cultural Exchang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096–10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2>

Abstract: The most direct impetus for Kim Taeg-young, a late Joseon Dynasty literatus, to embrace Tongcheng School prose stemmed from his share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with mid-to-late Qing intellectuals like Zeng Guofan, Yu Yue, Zhang Jian, and Yan Fu – confronting domestic turmoil and imperialist aggression during his exile in China. These experiences led his literary works to echo their urgent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salvation and survival. Fundamentally, Kim's reception of Tongcheng prose was rooted in his Cheng-Zhu Neo-Confucian orientation toward practical statecraft. Ideologically, this reception manifested through three key transformations: first, a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upholding feudal order to supporting republicanism; second, a preservation of Confucian moral pedagogy while discarding obsolete conventions; and third, a reorientation from traditional statecraft philosophy toward concrete social welfare and material progress.

Keywords: Kim Taeg-young;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Tongcheng School; Recep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YANG Huimin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uqian University,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Sino-Kore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562215624@qq.com.

中韓近代文化交流語境下 金澤榮漢文散文對桐城派散文的接受

楊會敏

宿遷學院

摘要：朝鮮李朝末期文人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最直接緣由，即他流亡中國前後與清朝中後期曾國藩、俞樾、張謇、嚴復等桐城諸子身處相似的內憂外患及帝國主義強勢入侵的歷史境遇，其散文創作皆發出了救亡圖存的時代強音。以程朱理學為宗的基礎上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術傾向是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內在因由。在思想內容上，金澤榮散文對桐城派散文的接受表現為：由強調程朱理學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功用轉向支持共和；既遵循程朱理學長於施展道德教化的傳統，又破除陳見；由發掘程朱理學的經世致用轉向利用厚生。

關鍵詞：金澤榮；漢文散文；桐城派；接受

一、引言

金澤榮(1850—1927)、董璋(1820—1884)、李建昌(1852—1898)、黃玪(1855—1910)被譽為朝鮮朝末期文章四大家，其詩文創作及文學思想在中韓文壇都頗具影響力。

目前，中韓學界重視金澤榮與江蘇南通文人群體的交往及他為近代中韓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貢獻，其漢詩創作與文學理論的研究較多，對其漢文散文進行文本細讀研究的成果極少。

在《歸有光與金澤榮的文學思想比較》一文中，文基連用影響研究的方法對金澤榮與歸有光的古文理論及創作特色進行了匯通比較，認為前者在文道與文質觀、師古與師法自然、文章的現實性、將壽序納入文稿等方面對後者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在其另一篇《朝鮮古文家金澤榮與歸有光的比較研究》中，文基連從「文道與文質的關係」「宗秦漢與宗唐宋」兩方面探討了金澤榮與歸有光古文理論的淵源關係。蔡德龍《儒者·文人·遺民——金澤榮文章學的三個面相》解析了金澤榮文章學的三個面相：作為儒者、理學家，建構「孔子文章學」，宣導文道合一，糾偏朝鮮理學家較為普遍的重道輕文的觀念；作為文人，指出中韓兩國古文創作處於「偽」歷史時期，具有「救一代文弊」的強烈使命感；作為遺民，金澤榮流亡中國後，積極整理韓國文人別集，編選《麗韓十家文鈔》，既想保存故國文獻，也有與中國文壇爭勝的微旨。金澤榮的文章深刻體現出中韓兩國近代文化的交融關係。^①可見，中韓學界對金澤榮古文理論的研究零散且視角不夠開闊，只是將其某些理論與中國歸有光的某些理論進行比較，而對其散文創作進行文本細讀的研究成果幾乎沒有。

仔細考究金澤榮散文的師承淵源，除了他自稱的「於文好太史公、韓昌黎、蘇東坡，下至歸震川」^②外，桐城派也與其有較深厚的淵源，不僅二者的古文觀一脈相承，在創作上金澤榮也深受桐城派的影響。本文擬就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歷史語境、內在因由及其在古文內容與藝術形式上如何受到桐城派影響並作出了哪些超越進行探討。

二、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歷史語境

桐城派作為有清一朝最大的古文流派，歷時二百餘年，不僅人數眾多，在地域傳播上甚至擴展至海外。學界一般將桐城派劃分為三個階段，早期以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櫟、姚鼐為代表，中期以順應時勢對桐城文風進行革新的梅曾亮、方東樹、曾國藩及曾門四弟子吳汝綸、張裕釗、薛福成、黎庶昌為代表，後期則以馬其昶、林紓、嚴復等為代表。金澤榮在《雜言九》一文中，對桐城派中興主將曾國藩散文極為推崇：「曾文正之文，能醇雅，能豪健，氣味在韓曾之間。近歲有人以三家文配之，號為「四大家」，然皆非曾敵也」^③。此外，他與後期桐城派張謇、嚴復、俞樾等人交好，特別是與張謇結為莫逆之交。金澤榮之所以能迅速地受到桐城派散文的濡染，首先主要得益於張謇所結交的龐大的桐城派群體。檢索莊安正先生所著《張謇先生年譜》中與張謇同時代並與之有交往或聯繫的中外人物，除了張謇的兩位桐城派恩師孫雲錦、張裕釗，其同門範當世、朱銘盤、馬其昶、吳汝綸、薛福成、王定安、許振祜、李鴻章、嚴復、張之洞、陳寶琛等桐城派重要人物皆在張謇的交際圈內。這無疑為倚靠張謇的鼎力相助得以在南通安定並供職於翰墨林編譯印書局的金澤榮提供了以詩文會友的便利。1905年，朝鮮亡國後，曾任朝鮮李朝王廷弘文館纂輯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澤榮流亡中國，在張謇的鼎力幫助下，金澤榮寓居南通，任翰墨林書局編校，長達22年，直到1927年辭世。金澤榮在南通出版了30餘部著作，「案牘之餘，金氏廣泛結交中國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些人中有被胡適列舉應該作傳記的中國文化名人俞樾、張謇、嚴復、梁啟超、屠寄、鄭孝胥等。他們意氣相投，詩文酬唱，書信往返，雅集宴飲，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值得紀念的篇章。」^④其中，嚴復便是與金澤榮在編譯局共事的嚴復的門生侯毅幫忙引薦並與之結交。

而金澤榮流亡中國前後的朝鮮局勢與中後期桐城諸子身處相似的歷史語境則是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最直接緣由。朝鮮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經歷了壬午兵亂、甲申政變、世紀末的大饑荒，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對於金澤榮本人來說，1905年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捩點。這一年，日本侵略朝鮮並脅迫朝鮮政府簽字以攫取朝鮮外交、海關等國家主權，他深知亡國已成既定事實，不願做亡國奴的金澤榮憤而辭官，攜妻女到中國。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這60年間，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內憂外患、國貧民弱及帝國主義列強的強勢入侵的生存境遇，金澤榮與中後期桐城諸子產生強烈的思想共鳴，既要救亡圖存、奮發圖強，又要捍衛和弘揚本民族文化。不管是曾國藩在姚鼐「義理、考證、文章」^⑤的基礎上加進了「經濟」要素、嚴復攝取西方進化論以強國、俞樾的「中體西用」，還是張謇的實業救國、金澤榮的以文章報國，都順應了救亡圖存、維繫和弘揚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時代要求。

三、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內在因由

在以程朱理學為宗的基礎上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術傾向是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內在因由。以桐城派而論，早期桐城三祖之一的劉大櫟最早強調古文的「經濟」要素，他在《論文偶記》中說：「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⑥。他將「經濟」視為文章的題材內容，反映出他強調文章的經世致用之意。其後，姚鼐的弟子姚瑩、劉開、方東樹、管同、梅曾亮等發揚了桐城派的經世傳統，在嘉道年間內憂外患的時局下，與當時一大批提倡經世致用、呼籲社會變革的經世派士大夫桴鼓相應，但他們所謂的「經濟」側重於修養心性的躬行實踐，而未能充分發揮其經世致用之本義。而太平天國後遭受沉重打擊的滿清王朝局勢將曾國藩推到了桐城派的前臺，他不再囿於程朱的義理之說，而是順應時勢地謀求救世救時的「經濟」之道，強調古文經世濟民的現實功用，也即他以務實求變的精神糾正了晚清以前理學各派偏重於道德內涵的傾

向，給日趨迂腐僵化的程朱理學注入了一絲活力。而金澤榮極為仰慕且到蘇州拜謁的古文大家俞樾（1821—1907），其雖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但最終目的乃通經致用，以道德教化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而幾乎與近代中國的歷史脈搏同呼吸、共命運的張謇，其一生經歷了變法維新、預備立憲、民主共和……，雖從小接受儒家經籍教育，古文師承桐城，但他不是空談性理的迂儒，也不囿於桐城派的理論主張和審美傾向，而是一位求真務實、關心民瘼，致力於經世致用的儒者。張謇不僅積極地興實業、辦教育以救國救民，也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擁護辛亥革命、擁護共和，順應時局之變。此外，與金澤榮結下深厚友誼的嚴複（1854—1921），一生中前後兩期經歷了由崇尚西學到回歸儒家傳統的轉變，但這兩者並行不悖，皆以經世致用、強國富民為旨歸。

而在流亡中國後定居南通 22 年的金澤榮或與早中期的桐城巨擘們面臨相似的歷史境遇，或與重要的桐城派代表幾乎處在同一時代。特別是與俞樾、張謇、嚴複等著名文人情趣相投、詩文唱酬，促成與深化了他以程朱理學為宗又重經世致用的學術傾向。且他與曾國藩、張謇、嚴複一樣以包容的心態提倡以諸學並存取代理學獨尊，體現出其經世致用之學的務實與通變精神。與曾國藩打破門戶之見一樣，金澤榮在恪守以程朱理學思想內核匯通韓愈的孔孟之道這一基本前提下，吸納王陽明心學理論、實學思想、佛教思想乃至西方基督教思想元素，開闢了以「心」為「體道」的核心樞紐，以性理學思想為內蘊又包容了韓愈式的經世致用思想的文道理論。這與一生既堅守程朱理學與維護三綱五常，又兼收百家之學與講究經世致用的曾國藩在學術導向、文論旨趣上驚人相似。俞樾除了賞識與獎掖金澤榮詩文外，他對金澤榮最大的幫助則是勸告其到上海投靠張謇，這無疑拉開了金、張二人長達 21 年的生死與共的友情的序幕。摯友張謇對金澤榮的積極影響則在於他以實業、教育救國的實踐感染着經歷了朝鮮亡國欲以文章報國的金澤榮。雖然金澤榮自小喜歡朝鮮實學派作家樸趾源的文章，深受其實學精神濡染，但他卻是在南通翰墨林書局做事時提出文章報國的思想：「愧無身手關時運，只有文章報國恩」（《寄黃梅泉》）^⑦。而他踐行文章報國主要依託於他所任職的南通翰墨林書局，而該局是張謇以教育和實業救國的重要組成部分。金澤榮十分欽佩張謇以實業強國、以教育救國的思想和踐行，他在 1905 年寓居中國南通後寫下的反思與批判朝鮮王朝治國方略的《韓史纂》中，曾大膽質疑程朱理學的治世功用。他認為朝鮮王朝衰敗的原因之一在於學術迂，而學術迂即只重理學之士而不知勸農興商，批判理學之士為「排斥不容，高談大言，虛偽成風者」^⑧，而極力呼籲「仍姑謝遣理學之士勸農興商，裕其財源。然後亟養兵士救其積弱，而尊待武人高於文臣。如是者一二十年，則庶乎其可救」^⑨。金澤榮為振興民族經濟提出的勸農興商無疑是對朝鮮李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糾偏。此外，金澤榮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形成更是受到了張謇的影響，作為 20 世紀初中國政治運動中立憲派的重要人物，張謇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張謇的巨大影響下，金澤榮熱情洋溢地寫下《感中國義兵事五首》歡呼辛亥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又寫了《呈南通縣官請入籍書》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無不體現他對中華民國的擁護和對共和政府的支持。質疑程朱理學和成為中國新民無不體現了金澤榮「已從一名舊儒學的忠誠衛道士變成了一名已接受了其他各種社會思想，不再死抱着經世理學不放的思想解放者」^⑩。而促成這一轉變的原因，除了其自身不斷求索和愛國救民的思想，「從外部因素而言，中國辛亥革命的勝利，遠比朝鮮李氏王朝強大的滿清王朝的一朝崩潰所帶來的劇烈震撼，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在 20 世紀初的急劇發展所導致的中國城市社會的變遷，以及他的摯友張謇從一名封建衛道士向一名新興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成功轉變的清晰可知的示範作用，都是對金澤榮有着巨大的影響力的」^⑪。金澤榮因編史需要而得以與之結交的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複對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嚴複翻譯《天演論》的主要目的在於以進化論原理喚起國民對日本鯨吞中國的野心的警醒，中朝兩國被外敵侵略的共同的歷史命運很容易引起金澤榮的強烈共鳴。他熱情地寫了三首詩贈給嚴複以表達其讚賞與敬佩之情，而他本人隨着近代中國歷史的演進而做出的與時俱進的思想抉擇則用行動詮釋了嚴複的進化論思想。金澤榮不僅將嚴複引為人生知己「一代真才惟汝在，古來知己與神通」



(《寄嚴幾道(其一)》)¹²，且稱讚其「絕學直隨時變化，文章斷說氣波瀾」(《寄嚴幾道(其二)》)¹³。他認為嚴複的文章順應時勢，是療救現實弊病的醒世良藥。

綜上，金澤榮與桐城諸子為同道中人，他們將程朱理學的精髓視為開啟民智、重塑國民精神和維繫民族文化的主體，且能熔鑄諸家學說以期經世致用、救亡圖強，正因為這種共通的學術傾向使他們在愛國救國思想上也達到了高度的契合。

四、金澤榮散文與桐城派散文在思想內容上的承繼與創變

由於金澤榮與桐城派面對中朝救亡圖存的相似的歷史境遇及共通的學術思想傾向，使其在文章道統、文統上頗具一致性，而在這種近似的道統、文統觀照下比較二者古文思想內容上的關聯與承繼更具宏觀性。究其實質，金澤榮與桐城諸子的文道觀既強調程朱理學付諸道德教化的踐履又挖掘傳統儒學內部經世致用思想，修身治內與理國治外兼重。這種義理、經濟合一的新型文道觀，糾正了理學末流的空疏弊病，增強了程朱理學的應變性和務實精神。而在這種本末兼備的文道觀的導引下，以斯文斯道自任的氣魄創作的古文無疑是對處於衰落中的傳統儒學的一種補救和發展。

(一) 由強調程朱理學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功用轉向支持共和

金澤榮與桐城諸子主張文道合一論，而所謂「道」則以程朱理學為儒學正統，這與朝鮮李朝、大清王朝將程朱理學作為實行與維護封建政治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是一致的。程朱理學之所以能成為李朝、清朝的官方哲學，因為其適應了封建王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不僅有助於鞏固王權，也有助於通過確立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建立各種政治文教制度及為統治者提供治國的思想謀略而強化其專制統治。

身處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向內憂外患的動盪年代的中興名臣曾國藩，由於以他為首的名臣將領們的力挽狂瀾，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局面。與之相呼應，作為桐城派中興主將，他與桐城先賢一樣認為發揮義理乃儒道中最大者，他上承孔孟，非常強調文以載道的功利作用，試圖以古文捍衛孔孟之道，進而服務於政治。除了重視載道，曾國藩還強調衛道與立言、立功、立德相結合，其弟子黎庶昌在《續古文辭類纂自序》中稱讚乃師能「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塗，挈覽眾長，輾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¹⁴，可見，身為政治家的曾國藩特別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功用。俞樾與桐城前輩曾國藩結下深厚情義，二人惺惺相惜，前者仰慕其文治武功，後者則稱賞其卓越的經學成就。俞樾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證也透露出鮮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如他將孔子看做立志改革的政治家，認為：「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托魯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後世。」¹⁵未轉變為立憲支持者以前的張謇「當民族面臨危機之時，他憑「匹夫有責」的良知投身愛國的洪流……為了改良國家政治，他「鼓新氣拔舊俗保種類明聖言」，不惜「燼燭累千言，滴滴銅人淚」地向清廷苦諫。……但也正是這種「治國平天下始於正心誠意」的心理導致了他未能衝破與封建君主、國家的情感認同並與之決裂。傳統的宗法觀念使他較注重「臣」的角色的言論和行動，盡「忠」制約了他否定君主制度的勇氣」。¹⁶張謇的「明聖言」「累千言」也體現了程朱理學維護綱常名教、強化君權的操控作用。如果說嚴複早、中年更傾向於崇尚西學，而其晚年則轉而強調「尊孔讀經」，其中《與熊純如書》言道：「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該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¹⁷非但如此，他甚至擁護帝制，希望恢復國家封建統治秩序，而認為民國造成民不聊生，且「終覺共和國體，非吾種所宜」。¹⁸

相比較於桐城諸子，金澤榮對程朱理學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這一問題上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思想階段，由流亡中國前認同程朱理學有利於封建統治轉變到流亡中國前後質疑程朱理學的治世功用。金澤榮主張

文以載道：「天下古今之言文章者，莫詳於孔子。其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所以言道非文莫形，而文與道一也。」^⑩而他所謂「道」指「詩書六藝之類皆其物」^⑪，更確切地說指孔子之道與程朱理學。正如他在《書深齋文稿後》中所言：「則其所論著性命經理之說之日臻於精。不問而可知。斯豈非誠有見於孔子所言之旨。而又能善學朱子。以救向之云云之弊者哉。」^⑫在一系列古文中，金澤榮着力論證孔教維護封建社會政治的至關重要性，《泗陽書室記》中作者慨歎孔道之衰微：「故見今中國以民而主天下之議論者，大抵多雜教之人，或以為孔子之道專制而非共和，或以為待孔子宜與他教等而不可獨尊，或以為孔子之道哲學而非宗教。或以為闕裏之祠可毀，吾道之存者，只如一發。而闕裏數畝之宮，殆哉其岌岌。」^⑬近代民主思想的興起，極大地動搖了孔道獨尊的地位，這讓仍作為虔誠的程朱理學信徒的金澤榮痛心疾首：「故有康南海氏者出，慨然以為孔教者中國之國教，國教亡，國安得獨存，遂飛書政府，極論其事，以攔主議者之頰。……則使康南海氏處於今日，飲水讀書於空山之中，而不動一手一足，至其孔教已亡、孔祠已毀而後，始乃洋洋作千萬言，徒以空言泄其感痛，其何益之有哉！」^⑭

由於作者未能看透康有為尊孔教為國教的實質是托古改制，即打着尊奉孔子大道的旗號，欲變革不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也未能明白梁啟超以啟蒙者的眼光在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時，往往連帶批判程朱理學^⑮，只是一味強調孔教的存亡關乎國家社稷之存亡。且金澤榮這裏所謂的「國家」並非梁啟超所謂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是指朝廷。這從他的《龜岡精舍記》可以得到印證，該文中，他將孔子作《春秋》以前的天下大亂歸咎於無道、無禮，而將孔子之後「至今二千餘年，亂臣賊子，狂夫淫婦，知所戒懼」視為「春秋之效果大著」，並結合朝鮮歷史論道：「若我故邦，其初之亂，蓋亦略如向之所雲，及高麗之季，國家始知聚麀之可恥，士民始知聖經之可尊，韓朝承之，益厲以昌之。」^⑯

金澤榮指出朝鮮高麗朝尊儒學，繼之而起的朝鮮朝又將程朱理學定為官學才因此昌盛，這裏的國家即指封建王朝。可見，他認為程朱理學有助於維護封建統治，其《丹山精舍記》、《重修通明宮附設經社記》等文中也表達了類似思想。而對於高麗末期打着征討遼東之大纛卻在威化島造反並最終篡奪政權的李成桂，金澤榮批判其「滅君臣之道者也」^⑰。

朝鮮王朝亡國前後，金澤榮愈來愈質疑並批判程朱理學的治世功用。他曾在《黃玹傳》中評述亡國前的朝鮮「外憂日重而政事日謬」^⑱，而形容當時處在封建官僚體制內的各級官吏則為「鬼國狂人」^⑲，這導致黃玹、申箕善、李道宰等諸多有識之士無意進取，拒絕封建朝廷的徵召。金澤榮由此便深入剖析此種政壇狀況，認為其原因有三：

其一，封建王朝禁錮思想、閉塞言路、大興史獄的專制獨裁。他在《韓史繫序》中大膽地揭露了造成駭人聽聞的燕山君執國時的史獄的真相，並進一步指出燕山君時期的史獄導致朝鮮儒林遭受重創，此後多年不聞孩子讀書聲。而英祖朝（1724—1775）以後，封建政權對思想文化的鉗制而造成其封閉性愈演愈烈，國內能稱為史著者，除去曆朝實錄外，只剩朝報，這無疑促使金澤榮撰寫《韓史繫》以延承國祚。

其二，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的血腥的朋黨之爭。朝鮮朝宣祖八年掌權的士林派分裂為東西兩黨拉開了長達 200 餘年的朋黨政治，其後，東人黨內部又分裂為南人、北人，北人黨又分裂為若干派別，西人黨又分裂為老論派、少論派，直至英、正祖時期實行「蕩平策」仍未能從根本上清除朋黨政治。雖然朋黨政治對朝廷內部各種政治勢力可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但總體而論，各個黨派之間無休止的爭鬥消解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凝聚力，也造成國家政局不穩。金澤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朋黨之爭的實質：「老黨之以時辟相戮者，豈為其義理哉。不過假國家之一大案以為一身祿位之媒介而已，可勝慨哉」^⑳。他認為在朝鮮朝中葉後得勢的老黨並不因為「義理」，也即其性理學思想，只不過打着其學術主張服務於治國方略和國家政策的旗號而謀求更大的政治權力。這種將國家發展大計視作謀取私利的腐敗行為勢必會導致封建政體日趨走向沒落。

其三，殘酷的封建門第制度戕害了大量的優秀寒士，不利於營造清明的吏治，也不利於積極地吸納外來



先進思想。朝鮮朝時期建立了遠比高麗朝更為集權的「兩班」官僚社會制度，確立了「士農工商」四民身份等級制度，而兩班階層即指排在首位的士族階層，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皆享有特權，特別是通過科舉、蔭敘、薦舉等方式成為統治階級的上層，又通過全面支持朱子學的官學化而成為固守儒家文化的實權統治者。這不僅導致朝鮮朝仕宦來源一直為兩班所佔據，大量寒士與仕宦無緣，也使其在文化上故步自封，不能接納新思想，最終難以抵禦外來殖民人侵而難逃亡國之厄運。金澤榮極力鞭撻了朝鮮門第制度之弊端與危害，其在《高麗季世忠臣逸事傳序》文中就曾指出：「顧韓之政弊，太尚門第，無名祖者擯於仕宦，於是乎窮鄉寒族之人，日夜所慕，惟在名祖，偽譜假錄，紛紜杜撰，則以餘之蔑劣」³¹，還如《敬陵令樸公墓碣銘》中也發出相似的感歎：「實世所謂門第之說，使之然也。嗚呼！自魏晉以來，殃人之國者，非此說耶。」³²

金澤榮抨擊門閥制度禍國殃民，極端蔑視那些為了擠進仕宦階層而不惜修改族譜、歪曲家錄的鄉下書生。而對洪世泰，李彥瑱，李尚迪、鄭芝潤等以詩歌聞名卻「不得為士大夫」³³且「受人踐蹂甚多」³⁴的象胥之人報以無限同情，哀歎其「故每落拓自棄，不求遠大之學，而惟用詩以自宣」³⁵，「其安得不摧折而至於夭也！嗚呼，此非所謂豐於才而歉於命者歟」³⁶。

如前所述，金澤榮對新思想的接納是其人生經歷與中國近代社會遽變的合力影響下的結果。剛歷經朝鮮亡國之痛的金澤榮避難中國，卻又趕上中華民族危機日趨深重的近代社會，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傳統儒學的經世致用內在地促使舊學走向了近代新學。以此而論，金澤榮同這一時期中國的精英知識階層一樣通過接受教育，其知識結構由以往的「衛道型」轉向「知識型」，由封建的衛道士轉變為近代新型的知識份子。

金澤榮對摯友張謇及其兄張督興實業、辦新學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義舉頗讚賞：「時季直擢上第已有年，而以國有外憂，斷進取規，興新學，思以為自強者，故叔儼棄江西官歸。以助其事，此書局所以有也。」³⁷他還為多位中國、朝鮮辦新學、啟民智的有識之士作傳、寫墓誌銘，或寫序跋題辭，稱讚他們見識卓越，興新學以匡時救世。尤其是他在《韓通政大夫礦務局主事李公墓碣銘》中力贊李公反駁那些「概皆以新學之主功利而不樂言之」³⁸的嶺湖學士大夫，而稱舊學之末流也為功利之學，並毅然地送三子留學國外，雖學成歸來，未及施展大用，朝鮮淪喪，但李公堅信國家之淪喪「乃執政者之罪而非新學之故」³⁹。此外，金澤榮盛讚張謇由立憲轉為共和，其曾在《張季子詩錄序》中說道：「既而中國之形變為共和。……雖其事業之所極，今不可預言。」⁴⁰可見，他已不再像曾國藩堅持舊學為體、西學為用，也不像嚴復那樣提倡變革中國的君主專制，而是主張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他在辛亥革命後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即是對中華民國的擁護和對共和政府的支持，只不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導致共和制度的實施亂象叢生，金澤榮也由此感到失望。

綜上，金澤榮由強調程朱理學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功用轉向支持重視辦新學、啟民智的立憲，再轉而支持共和，其思想觀念的演進與中國、朝鮮的救亡圖存同步發展，其思想轉變具有時代特徵，也體現了他在中朝兩國近代巨變中與時俱進、不斷探索的精神。

（二）既遵循程朱理學長於施展道德教化的傳統，又破除陳見

桐城諸子與金澤榮都非常看重程朱理學長於施展道德教化的功能，主張用禮樂規範天下萬民，以達到治國齊家之目的。作為程朱理學的信徒，曾國藩入嶽麓書院求學時，掌教的歐陽厚均推崇理學，將朱熹手書「忠孝廉節」四字匾額於講堂，深受濡染的曾國藩其後一直恪守進德修業。張謇一生將仁義禮智信作為人生準則，以其交友為例，他因為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而與之斷然絕交，對金澤榮這樣一位不願做亡國奴的異國友人能俠義相助，在家庭關係中，既彰顯了儒者本色，又不為綱常倫理規範所囿。在金澤榮眼中，張謇不愧為忠孝節義的典範，其曾在《張退翁六十壽序》中讚歎曰：「今先生則不然，於家則為人之孝子慈兄，於鄉則為人之耆德，於郡縣則為人之賢官，於公益則為人之義民。凡其所為，無一之不直，則吾之愛之，豈非情之正。」⁴¹嚴復提倡尊孔讀經以養成忠、孝、節、義的道德精神，他甚至宣導將其奉為立國精神，並在《導揚中華民國立

國精神議》中提出具體措施,可見其良苦用心。金澤榮認識到良好的社會風氣須靠正學士人的「理氣之旨,心思身踐」^①(《成均進士默庵金公墓碣銘》),而這些身正學高之士「譬如和風慶雲之日,故禮教之入人也易」^②(《二禮辨疑序》)。因此,他對於近世儒道淪喪、人心澆漓之狀倍感憂心:

自近世選法崩壞以來,人之無故而貴者多矣,於道德經濟文學,鮮有所聞。徒挾其書牘律令尺寸之末,往往躡取高官,則彼其所以致之者,豈能盡出於忠孝直道也。(《送王注書原初入大屯山讀書序》)^③

而實則教民以懶惰與澆薄也。故士大夫之饒者,寧人蓄一姬一飲百金,而不肯合巨力以成國家一大事。鄉里之富者,以匿財為能,慈善之舉,鮮有行者。……奸蠹橫出,遂以破敗而止,於是乎零丁孤子,貧窳枯槁,萬事無一可濟,而遂至於今日矣。(《梅泉集同刊錄序》)^④

金澤榮痛斥那些只知執行律令而不敢批評君主之過失的趨炎附勢之徒,那些沉湎於個人淫樂而不願慷慨為國成一事的虛偽的士大夫,那些徇私舞弊、蠅營狗苟又不肯行善的鄉里富人,認為他們這種劣行導致今日的破敗與「萬事無一可濟」。

金澤榮嚴夷夏之辨,辨忠奸之分,他不甘心做亡國奴,憤而辭官,亡命中國,此後常以「高麗遺民」「韓客」「韓僑」自稱,須臾不忘故國,且常與朝鮮的愛國志士密切聯繫以期能光復河山。旅居南通時,他踐行修史救國、以文章報國,為諸多浴血疆場、慷慨赴死的朝鮮忠臣義士作傳,大力宣導忠義精神。與近代不少中國思想家一樣,金澤榮受夷夏之辨思想之左右,仍然視竊據華夏的滿族建立的清朝為非正統政權,而力挺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其在《馮君文稿序》一文中指出:「滿人之於中國,猶羈者之租人屋也,然租之之久,已近三百年,其牆壁柱礎之修治,亦甚牢固矣。而武昌之一夫,一朝鼓鼓而起,圮其屋猶掃葉也。」^⑤這也是他在辛亥革命後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深層原因。金澤榮為於朝鮮危亡之際以身許國的愛國志士立傳,如《安重根傳》、《崔宇淳傳》、《金松庵傳》、《安孝濟傳》、《洪範植傳》、《黃玪傳》等,稱讚他們忠於祖國、憂國憂民、力挽狂瀾,不惜身殉,如日月之清明。他堅信振國興邦之大業須倚靠此等像韓愈一樣具有精誠之志的忠良之才:「然而吾邦今日之事,尚有大於逐鱷者,不知君將繼而有為,使我酌酒以俟之也耶。」^⑥在儒家思想價值體系中,忠孝同構,彼此不可分離,忠臣孝子成為儒士心中的主流道德形象,金澤榮作《崔孝子墓碣銘》、《天山趙君墓碣銘》表彰孝子孝行。

金澤榮對「節」的理解更為包容與開明。他跳出儒家傳統所認可的賢慧能幹、通情達理、矢志守節的女德之藩籬,在《閨門軌範序》一文中,他主張朝鮮女子若能像滿清女子一樣「鏟去砧杵一事,女子之受教,庶或益專,而布帛之壽,縫刺之省,亦可以語矣」^⑦,此種提倡男女分工精細化、專業化的想法頗具前瞻性。更為前衛的是金澤榮敢於為妓女作傳,其《都明珠傳》極力為妓女辯護,首先,他質疑儒家男女綱常:「男兼有妻妾,而女終身於一夫,此其設教之大綱也。」^⑧進而為遭遇不幸且迫於生計的再嫁婦女正名,最後,他大膽挑戰鄭衛淫婦不能列於經的儒家傳統,為妓女明珠作傳,並道出個中原因:「其跡雖甚穢,而其情誠可哀,故特敘之,以見天下古今禦世育民之難。」^⑨而對於「士」的節操,潔身自好、不慕名利、寬宏大量、光明磊落乃其要義,他在《可穀樸處士墓碣銘》中鞭撻了朝鮮肅宗以後興起的一股以退居山林講學為名而沽名釣譽之偽處士之風潮,而稱賞能獨立不遷、身處衰世而出淤泥而不染的真正的儒雅之士。

(三) 由發掘程朱理學的經世致用轉向利用厚生

由前所述,在以程朱理學為宗的基礎上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術傾向是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內在因由。相較於曾國藩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及其曾門弟子以科學、教育救國,張謇以實業、教育救國,嚴復為救亡圖存而翻譯西學卻最終由西學轉向中學,金澤榮則在清朝、朝鮮朝實學思想及西學深刻影響下,由開掘程



朱理學的經世致用轉向利用厚生。

朝鮮朝實學派思想家樸趾源勇敢地打破中國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框架，將儒家先賢們列為首位的「正德」顛倒至末位，其在《渡江錄》中言道：「利用然後可以厚生，厚生然後其正德矣。不能利用而能厚其生，鮮矣！生既不足以自厚，則亦惡能正其德乎。」⁵⁴而「厚生」被置於首位。金澤榮在《重刊養蠶鑿序》一文中以反諷手法極力贊同「利厚」決定「正德」：「於是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一切皆歸於正德之科，以竭其心力。而寄在雜流者，大抵皆庸人愚夫，困窮無食者也，是以輒極論唐虞三代利厚之本意，以增益諸君子之意氣。」⁵⁵他在《金通政墓碣銘》甚至認為崇尚道德而不屑於「生產作業」導致了韓國亡於貧困：「噫！吾韓政俗專崇道德文學，而不屑於生人之事，故人之述其父祖之行者，每略其生產作業，而尤以富為諱，猶若羞恥然，此韓之所以亡於貧也。」⁵⁶與之相應，他痛斥科舉弊端仍空談道德修養問題而不重經世濟民之策，在《蘭樵玄士墓碣銘》一文中曾痛惜蘭樵玄士：「哲宗末，應旨對三政策，仿賈誼《治安疏》之意，言賦以流涕，言兵以太息，言糴以痛哭，而終之以矯救之方，凡數千言，竟亦不見省。」⁵⁷

以重實務、輕性理空談的實學思想為導向，金澤榮創作了不少散文大力頌揚那些致力於利用厚生、發展農、工、商、兵，重教育、興科技的經世致用之才。《邢白山詩稿序》用寥寥數語勾勒出一位善於經商又多行仁義的文士，金澤榮不禁贊曰：「此所謂移用風雅之才於商業者也。」⁵⁸而在《張齋翁六十壽》文中，金澤榮對摯友張謇及其三兄張謇、友人宋躍門讚歎有加，稱讚張謇「而尤邃於經濟」⁵⁹，讚歎張謇在仕途通暢時毅然辭官鼎力協助其弟辦實業、興教育，「其他農務荒政，河渠道路，一切公益之事，亦莫不與殿撰協擔，州裏賴之」⁶⁰。在《宋躍門墓表》中，稱許張氏兄弟辦學校借鑒外國之學制，具有國際視野，其友人宋躍門幫助他們督辦公益機構，如馬路測繪局，醫校圖書館，養老院，盲啞學校等。金澤榮稱賞在研經之餘，「樂觀古今國家經濟之書，以及近世外國財政兵策之紀錄，亦略考審其肯綮，而思所以接應拒禦之方」⁶¹的梁處士；另有以勤儉持家、善治產業又「敦厚周密，戰兢自持，以行陰德，為平生處世之大本」⁶²的金進士，「以及兵刑錢穀之屬，無不究之」⁶³的董璋，協助長子督查農墾公司、經營小農經濟的朱人千等，皆受到金澤榮讚譽，從以上的語句表述可清晰地梳理出金澤榮認同的利用厚生決定道德修養的邏輯理路。

五、結論

總之，流亡中國前後的金澤榮與中後期桐城諸子曾國藩、俞樾、張謇、嚴復等在面對國家內憂外患且遭遇帝國主義強勢入侵的時代困境時，產生強烈的救亡圖存、捍衛本民族文化的思想共鳴，這是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最直接緣由，而在以程朱理學為宗的基礎上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術傾向是金澤榮接受桐城派散文的內在因由。

由於分別身處程朱理學均被官學化的朝鮮朝與清朝，金澤榮與桐城諸子的文道觀既強調程朱理學付諸道德教化的踐履又挖掘傳統儒學內部經世致用思想，即修身治內與理國治外兼重，這種義理、經濟合一的新型文道觀決定了二者在散文創作思想內容上的相通性，均強調程朱理學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功用、遵循程朱理學長於施展道德教化的傳統與發掘程朱理學的經世致用的潛能。而遭遇了亡國之痛的金澤榮在中、朝近代遽變的時勢及中、朝傳統程朱理學思想與西方近代思想激烈碰撞中，理性地質疑程朱理學的治世功用，批判其導致封建王朝禁錮思想、閉塞言路、大興史獄的專制獨裁，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的血腥的朋黨之爭，以及殘酷的封建門第制度戕害了大量的優秀寒士，不利於營造清明的吏治，也不利於積極地吸納外來先進思想。由此，金澤榮由強調程朱理學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功用轉向支持重視辦新學、啟民智的立憲，再轉而支持共和。此外，金澤榮對有益於維持倫理綱常的程朱理學的「忠孝節義」作出了新的詮釋，由「忠君」上升為愛國，對「節」的理解不再局限於「節婦」與不屈不撓、敢於擔當的愛國志士的窠臼，對迫於現實生活困

境的妓女與身處衰世而獨立不遷、潔身自好的儒士也報以同情與尊重。金澤榮還在清朝、朝鮮朝實學思想及近代西學深刻影響下，由開掘程朱理學的經世致用轉向利用厚生，並堅信利用厚生決定道德修養，以此反觀他認為傳統的被作為治國安邦、經世濟民的官方哲學專注於空談心性與禮數，以前所起的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與教化醇正民眾的效用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在民族存亡的緊要時刻，利用厚生才能富國強民。

可見，中朝兩國近代巨變與金澤榮自身與時俱進的探索精神造就了其遠見卓識。當然，金澤榮恪守迂腐的「夷夏之辯」，不能正視滿清文明比之明朝取得的進步與發展，體現了其視野的局限性。所幸的是，流亡中國後的他趕上了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得以由朝鮮遺民成為中華新民，但卻在個人與社會多重壓力下最終吞食鴉片自殺，不免讓人扼腕歎息。

注釋

- ① 蔡德龍：《儒者·文人·遺民——金澤榮文章學的三个面相》，《古代文學理論研究》，2024年第1期，頁449。
- ②③⑦⑫⑬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金澤榮：《韶漢堂集》，《韓國文集叢刊(347)》，首爾：景仁文化社，2005年版，頁151-489。
- ④ 周昶、倪怡中：《金澤榮和中國文化名人的詩文交往》，《南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2期，頁109。
- ⑤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頁104。
- ⑥ 劉大櫟：《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頁3。
- ⑩⑪ 錢健：《從〈韓史祭〉識金滄江的歷史批評觀》，《中韓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金滄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通：金滄江研究所，2003年版，頁140。
- ⑭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頁2。
- ⑮ 俞樾：《春在堂全書》(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頁41。
- ⑯ 張喜陽：《論張謇政治思想的嬗變及特徵》，《論張謇——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118。
- ⑰⑱ 嚴複：《嚴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611-668。
- ㉒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頁128。
- ⑧⑨㉑ 金澤榮：《韓史祭》，南通：翰墨林書局，1914年版，頁3-9。

參考文獻

- ① 蔡德龍：《儒者·文人·遺民——金澤榮文章學的三个面相》，《古代文學理論研究》，2024年第1期，頁449-466。
- ② 金澤榮：《韶漢堂集》，《韓國文集叢刊(347)》，首爾：景仁文化社，2005年版。
- ③ 周昶、倪怡中：《金澤榮和中國文化名人的詩文交往》，《南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2期，頁109-115。
- ④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⑤ 劉大櫟：《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 ⑥ 錢健：《從〈韓史祭〉識金滄江的歷史批評觀》，南通：金滄江研究所，2003年版。
- ⑦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
- ⑧ 俞樾：《春在堂全書》(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
- ⑨ 嚴學熙：《論張謇——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⑩ 嚴複：《嚴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
- ⑪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 ⑫ 金澤榮：《韓史祭》，南通：翰墨林書局，1914年版。
- ⑬ 彭青龍：《世界文化多樣性與交流互鑒》，《外國語文》，2022年第6期，頁1-8。